



神曲

〔意大利〕但丁著



(京)新登字002号

Dante Alighieri

La Divina Commedia

Inferno

神曲 地狱篇
SHENQU DIYUP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字数229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37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27551—47550

ISBN 7-02-001426-7/I·1296 定价15.00元

译本序

——但丁和他的《神曲》

但丁·阿利吉耶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是意大利的民族诗人，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继往开来，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

但丁的创作和他的生平与时代关系极为密切。他生活的时代是十三世纪后半和十四世纪初年。十三世纪，意大利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北部小邦林立，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是独立的或自治的，其中有经济繁荣的城市共和国，也有受封建主统治的小国。这些小邦之间和小邦内部由于利害冲突时常进行斗争，乃至发生内战。中部是教皇领地，教皇既是西方教会的最高权威和精神领袖，又是拥有世俗权力的封建君主。他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和领土，经常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插手小邦之间和小邦内部的斗争。神圣罗马皇帝一般从德意志诸侯中选出，但在法理上拥有对意大利的统治权，有实力的皇帝也力图行使这种权力。因此，教皇和皇帝之间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各小邦和小邦内部的政治力量，根据不同的利害关系，分别依靠这两个最高的封建权威，形成了贵尔弗和吉伯林两个对立的党派，前者号称教皇党，实际上主要代表新兴的市民阶级和城市小贵族，后者号称皇帝党，主要代表封建贵族。贵尔弗和

吉伯林两党的划分，一二一六年最初出现于佛罗伦萨，当时具有和后来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立场，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逐渐遍及其他地区。南部是西西里王国，原在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下，一二六八年为法国安茹伯爵查理所夺，他建立的安茹王朝成为教皇的同盟军和贵尔弗党的后援。一二八二年，意大利人民为反抗法国统治者的暴政，发动了“西西里晚祷”起义，消灭了岛上的驻军。十四世纪初年，西西里岛落入阿拉冈王国之手。安茹王朝失去了西西里后，仍统治着半岛南部，称那不勒斯王国。神圣罗马帝位自从一二五四年霍亨斯陶芬王朝告终，二十年间一直虚悬，历史上称为“大空位时代”(1254—1263)。这时意大利实际已经不受皇帝控制，但是贵尔弗和吉伯林的斗争仍然继续下去。以上所述就是但丁时代意大利的政治概况。

但丁于一二六五年五月下旬出生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共和国当时是意大利最大的手工业中心，以呢绒和丝绸工业著称，银钱业也很发达，人口约六万到七万，是欧洲最富庶的城市。十三世纪前半，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一二五〇至六〇年间，市民阶级壮大起来，贵尔弗和吉伯林两党斗争日益激烈。一二六六年，贵尔弗党获得最后的胜利，结果使佛罗伦萨成为全托斯卡那贵尔弗党的坚强堡垒。

但丁出身城市小贵族，自称是古罗马人的苗裔。高祖卡洽圭达(Cacciaguida)随从神圣罗马皇帝康拉德三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1147—1149)，被封为骑士，战死在圣地。高祖母是波河流域的人，她的姓氏阿利吉耶里(Alighieri)后来成为家族的姓氏。但丁的家族是贵尔弗党，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宽裕。他五、六岁时，母亲贝拉(Bella)去世，一二八三年左右，父亲阿利吉耶罗(Alighiero)去世。一二七七年，他

由父亲作主，和杰玛·窦那蒂(Gemma Donati)订婚，结婚后至少生了两个儿子：彼埃特罗(Pietro)和雅各波(Jacopo)，一个女儿：安东尼娅(Antonia)。彼埃特罗和雅各波兄弟二人，都是《神曲》最初的传抄者和注释者。

但丁少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学校里学到了有关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学的初步知识，后来又从著名的学者勃鲁奈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学过修辞学，包括演说和写拉丁文书信的艺术，这对于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是必要的。他大概还在著名的波伦亚大学听过修辞学课。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学，接触到拉丁诗人的作品，法国骑士传奇和普洛旺斯骑士抒情诗。十八岁时，他已经自己学会了作诗。当时佛罗伦萨是波伦亚诗人圭多·圭尼采里(Guido Guinizelli)创立的“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中心。但丁和这个诗派的一些诗人互相赠答，并和诗派的领袖圭多·卡瓦尔堪提(Guido Cavalcanti)结成深厚的友谊。但丁赠给卡瓦尔堪提等诗人的第一首诗，是一首抒写自己对贝雅特丽齐(Beatrice)的爱情的十四行诗。据考证，贝雅特丽齐是福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的女儿，后来和西蒙奈·德·巴尔迪(Simone dei Bardi)结婚，一二九〇年逝世。但丁对她的爱情是精神上的爱情，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在歌颂她的诗中，把她高度理想化，描写为“从天上来人间显示奇迹”的天使，充满精神之美和使人高贵的道德力量。在她死后，但丁把抒写对她的爱情、寄托对她逝世的哀思以及其他有关的诗，用散文连缀在一起，构成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约1292—1293年)，取名《新生》(Vita Nova)，除了《神曲》以外，它是但丁最重要的作品。书中使用了中古文学所惯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等艺术手法。全书的末尾说，作者经历了一番“神奇的梦幻”之后，“决定

不再讲这位享天国之福的人，直到自己更配讲她的时候”，到那时，关于她要“讲人们关于任何一位女性都未讲过的话”。这就是但丁写作《神曲》的最初的动机。

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情是但丁作为诗人的意义深远的生活经验之一。在她死后，但丁开始了勤奋学习、追求真理的时期。为了在悲痛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他潜心研究哲学，先后阅读了波依修斯的《论哲学的安慰》、西塞罗的《论友谊》和其他哲学著作以及塞内加的《道德对话》，还旁听修道院里宗教家的讲课和哲学家的讨论，广泛阅读经院哲学家大阿尔伯图斯、托马斯·阿奎那斯和阿拉伯哲学阿威罗厄斯等人的著作，又从托马斯·阿奎那斯上窥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他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与此同时，他还加深了对拉丁文学的理解，精读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贺拉斯的《讽刺诗集》和《诗艺》、奥维德的《变形记》和卢卡努斯的《法尔萨利亚》。他博览群书，掌握了中古文化领域里的丰富的知识，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他并不是书斋里的学者，相反地，一二八九年六月堪帕尔迪诺(Campaldino)之战，他作为骑兵先锋对阿雷佐的吉伯林军作战，同年八月，又参加了攻占比萨的卡波洛纳(Caprona)城堡的战斗。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了政治生活。

一二六六年贵尔弗党最后战胜吉伯林党后，佛罗伦萨内部斗争仍很激烈。一二九三年，贵族的统治被推翻，建立了行会民主政权，行政机关由六名行政官组成，任期两月，期满改选，代表富裕市民阶级，即羊毛商、丝绸商、呢绒场主、毛皮商、银钱商、律师以及医生和药剂师七大行会，称为“肥人”。行会民主政权不许贵族担任行政官，但在外交和军事方面使用他们。堪帕尔迪诺之战，贵族立了大功，开始飞扬跋扈起来。为此，行会民主政

权于一二九三年颁布“正义法规”，规定凡非实际从事一种行业者，一律不许担任公职，严格限制了贵族的政治权利；一二九五年七月，对“正义法规”进行了修改，规定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就可担任公职。但丁出身小贵族，为了参加政治活动，加入了医生和药剂师行会。一二九五年十一月到一二九六年六月，他是人民首领特别会议的成员；一二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是被征求关于选举行政官问题的意见的顾问之一；一二九六年五月到九月，是百人会议的成员（百人会议是市议会性质）；一三〇〇年五月，任特使，邀请圣吉米尼亚诺市参加托斯卡那贵尔弗党城市联席会议；接着，当选为六名行政官之一，任期从一三〇〇年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

当时，佛罗伦萨贵尔弗党已经分裂成黑白两党，黑党的首领窦那蒂(Donati)家族（但丁的妻子来自这一家族的支派）是世系悠久的贵族，对行会民主政权不满，一方面同以切尔契(Cerchi)家族为代表的“肥人”作斗争，一方面煽动“瘦人”即平民反抗、闹事。白党的首领切尔契家族是新贵族，从乡间来到城市后，暴发致富，成为大银行家和大商人，为了保障经济利益和过和平生活而拥护行会民主政权。黑白两党的斗争，除了家族仇恨和阶级矛盾以外，还掺杂着私人之间的冤仇以及个人的野心、贪欲、专横等因素，情况异常复杂。不仅如此，佛罗伦萨的内讧，还由于外来的干涉而变本加厉。这种干涉来自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他野心勃勃，借口神圣罗马皇帝阿尔伯特一世(1298—1308)尚未加冕，帝位依然虚悬，企图代行皇帝的权力，把托斯卡那全境置于教廷的统治下。

但丁任行政官时，以共和国的利益为重，置身党派斗争之外。他就职后不久，黑白两党发生了流血冲突，严重危及社会秩

序。他秉公处理这一事件，建议政府将两党首领各七名流放到边境，其中包括他的好友白党首领圭多·卡瓦尔堪提。对于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他坚决反对，在职期间，顶住了教廷的压力，挫败了教皇使节的阴谋诡计。佛罗伦萨政府的坚强态度激怒了教皇，他下令把在职的行政官逐出教门，由于教皇使节迟迟没有执行，而但丁任期已满，才免遭惩罚。

离开行政官职位后，但丁继续参加政治斗争，一三〇一年三月，在顾问会议上，反对向和教皇勾结的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二世拨款，支援他重新征服西西里；同年四月到九月，他再度是百人会议的成员，在六月十九日的会议上，讨论是否应以武力支援教皇对阿尔多勃兰戴斯齐(Aldobrandeschi)家族作战，发言表示反对；他的意见由于得票少而被否决。在这同时，黑党企图借助教皇的力量取得政权，表示赞成教廷干涉佛罗伦萨的竞争。但丁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靠拢态度比较温和、对共和国前途比较关心的白党。在黑党的请求下，教皇派遣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弟弟瓦洛亚(Valois)伯爵查理去佛罗伦萨，以调解两党争端为名，实则暗助黑党战胜白党。一三〇一年十月，查理即将来到时，白党执政的政府派遣但丁和另外两名代表去教廷交涉，以挽回危局。但丁滞留罗马期间，黑党在查理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对反对党大肆报复迫害。一三〇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但丁缺席被判五千小佛罗林的巨额罚金，流放在托斯卡那境外二年，永远不许担任公职，罪名是贪污公款，反对教皇和查理，扰乱共和国和平。但丁在外地听到这一消息后，拒不承认强加的罪名和回乡交纳罚金，三月十日，又被判处永久流放，一旦落入共和国政府之手，将被活活烧死。他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至死未能返回故乡。

但丁意识到自己是为维护共和国的独立而被放逐的，所以“认为自己遭到的放逐是光荣”。最初他曾同白党和吉伯林党流亡者一起，试图用武力打回家乡，结果失败，以后不久，就离开了“那一群邪恶、愚蠢的伙伴”，自成一派，只身漂泊异乡，行踪不定。他首先投奔维罗纳封建主巴尔托罗美奥·德拉·斯卡拉(Bartolomeo della Scala)的宫廷。一三〇六年，他在卢尼(Luni)地区玛拉斯庇那(Malaspina)侯爵的宫廷作客。在长期流浪中，他慨叹自己不得不作为行旅，几乎是乞讨着，“走遍几乎所有说这种语言(指意大利语)的地方”，好象“既无帆，又无舵手的船，被凄楚的贫困吹来的干风刮到不同的港口、河口和海岸。”他深切感到“别人家的面包味道多么咸，走上、走下别人家的楼梯，路多么艰难”。流亡者的辛酸使他更加思念故乡，关怀家人的命运，尤其是因为按照一三〇三年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他的儿子们满十四周岁，就要和他一样遭到放逐。他打算写出有学术水平的著作，来恢复和提高受到放逐和贫困损害的声望，引起家乡的重视，借以实现还乡的愿望。为此，他于一三〇四年到一三〇七年间撰写了《论俗语》和《筵席》。

《筵席》(1304—1307)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学术著作，借铨释作者的一些诗歌，把各种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精神食粮，故名《筵席》。原计划写十五篇，但只完成了四篇。这部著作显示出但丁博闻强记，学识渊深。其中介绍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斯，其次是《圣经》和其他哲学家、神学家的著作，基本上局限于经院哲学的思想范围，但也不乏独到的见解。书中关于“高贵”的观点值得注意。作者认为“高贵”在于个人天性爱好美德，不在于家族门第，强调“不是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批判了封建等级

观念和特权思想。书中还论证了帝国的必要性，认为它是天命注定为保障人类享受现世幸福而建立的。这种思想在《帝制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筵席》的重大意义尤其在于强调理性，指出“人的生活就是运用理性”，“去掉理性，人就不再成其为人，而只是有感觉的东西，即畜生而已”，认为真正使人高贵、接近于上帝的就是理性。这种观点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曙光。书中还阐明了诗的四种意义：即字面的、寓言的、道德的、奥秘的四种意义。这是中世纪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的概念，但丁在给堪格兰德·德拉·斯卡拉 (Cangrande della Scala) 的信里再次加以阐述，对于《神曲》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当时，学术性著作一般都使用拉丁文，作者在说明用俗语写《筵席》的原因时，盛赞意大利俗语，预言它将来要战胜拉丁文，并且斥责“赞美人家的俗语（指法语和普洛旺斯语），贬低自己的俗语的坏意大利人”，表达了他对祖国语言的热爱。在《论俗语》中，但丁更详尽地阐述自己关于意大利俗语的论点。

《论俗语》(1304—1305)是一部关于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使用拉丁文撰写，目的在于引起知识界对民族语言问题的重视，因为意大利在当时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不仅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有重大意义，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但丁不用拉丁文而用意大利俗语写《神曲》的理论根据。这部著作原来计划至少写四卷，但只写到第二卷第十四章为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识到法语、普洛旺斯语和意大利语三者同出一源，讲到意大利语时，根据各地方言的特点，把全国方言分成十四种。这些科学成果，就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使但丁不愧为近代语言学的

先驱之一。作者把重点放在解决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的问题，逐一检查了全国方言中哪一种可以作为标准语和文学用语，发现这十四种方言，连最占优势的托斯卡那方言（但丁自己的佛罗伦萨方言属于这一系统）在内，无一够上标准，但是每一种方言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标准因素。他认为，只有圭多·卡瓦尔堪提和他自己以及其他优秀作家的语言，才适合做标准语和文学用语。这一论点强调了作家在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中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神曲》的出现以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

在放逐期间，但丁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接触社会各个阶层，加深了爱国思想，丰富了生活经验，视野从佛罗伦萨扩大到意大利全国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他看到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处于纷争混乱的状态，探索了祸乱的根源和拨乱反正的途径，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之路的历史使命，认为自己作为诗人，就是要通过创作一部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完成这一使命。为此，他中断了《论俗语》和《筵席》的写作，大约于一三〇七年开始创作《神曲》。

在这同时，欧洲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由于对外进行战争，财政困难，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和教廷发生冲突。卜尼法斯八世宣布把腓力逐出教会。腓力派遣密使去罗马，勾结教皇的仇敌科隆纳家族共同反对教皇，一三〇三年九月七日，在罗马附近的阿南尼逮捕了教皇。教皇遭此侮辱，不久死去。继任的教皇在位仅九个月。一三〇五年，波尔多大主教依靠腓力四世的势力当选为教皇，称克力门五世。他把教廷迁到邻近法国边境的阿维农城，从此教廷受法国控制达七十年之久（1308—1378），史称“阿维农之囚”。一三

一〇年新选的皇帝亨利七世南下来意大利加冕，声称要伸张正义，消除各城市、各党派的争端，使一切流亡者返回故乡，还要重新建立帝国和教会之间的良好关系，实现持久和平。但丁得知这一消息后，对他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写了致意大利诸侯和人民书，号召对皇帝表示爱戴和欢迎，大概还亲自到意大利北部谒见皇帝，向他致敬。但佛罗伦萨联合贵尔弗党诸侯和城市，武装反抗皇帝。为此，但丁于一三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卡森提诺地区写了《致穷凶极恶的佛罗伦萨人的信》，愤怒声讨他们的罪行，又于四月十六日上书给皇帝，敦促他从速进军讨伐。但亨利七世并未向佛罗伦萨进军，而于一三一二年前往罗马加冕。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公然和他为敌，否认他的权力，预先占据了梵蒂冈，阻止皇帝在圣彼得教堂加冕，致使加冕礼被迫在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举行。教皇克力门五世在阿维农害怕腓力四世势力太大，企图以神圣罗马皇帝为外援，所以曾赞助亨利七世来意大利，但后来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改变了态度，唆使各地贵尔弗党纷纷起来反对皇帝，并且警告亨利七世不得进攻那不勒斯王国。在这种情况下，亨利离开了罗马，挥军北上包围佛罗伦萨，但丁由于对故乡的热爱，没有亲自参加，但他对亨利的事业，始终在精神上给以热情支持。为了从理论上捍卫皇帝的权力，他在这段时间用拉丁文撰写了《帝制论》。

《帝制论》(1310—1312)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地阐明但丁的政治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色彩。全书共三卷：第一卷论证帝国的必要性，指出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才能，这只有在皇帝的统治下，正义、和平与自由得到保障的局面中，才能实现。第二卷论证天意注定建立帝国的权利归于罗马人。第三卷指出万物当中只有人既具有可毁灭的

部分(肉体)，又具有不灭的部分(灵魂)，因此人生有两种目的，一是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二是来世享受天国永恒的幸福；上天规定由两个权威分别引导人类达到这两种不同的目的：皇帝根据哲学的道理，引导人类走上现世幸福的道路；教皇根据启示的真理，引导人类走上来世享受天国之福的道路，这两个权威都是直接受命于天，彼此独立存在的。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但丁首先肯定现世生活有其自身的价值，不从属于宗教上来世永生的目的，并且以此为出发点，阐明政教分离，教皇无权干涉政治的观点，向神权论提出英勇的挑战，意义是重大的。《帝制论》中的观点在《神曲》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亨利七世围困佛罗伦萨失败后，准备南征那不勒斯王国，于一三一三年八月病死。但丁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化为泡影，但仍然坚信一定会有拨乱反正的人出现。然而，还乡的愿望是绝不可能实现了。一三一年九月，佛罗伦萨政府对流亡者实行大赦，但丁由于写了《致穷凶极恶的佛罗伦萨人的信》，不在赦免之列。一三一五年五月，佛罗伦萨政府又宣布，流亡者交付少量罚金，并亲往圣约翰洗礼堂当众把自己奉献给城市的守护神圣约翰，就可获准还乡。一位佛罗伦萨朋友劝但丁利用这个机会。但丁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坚决拒绝在这种变相认罪的屈辱条件下还乡，信中说：“那么，这就是在忍受了几乎十五年的流亡之苦后，但丁借以返回故乡的宽厚优惠的召还流亡的法令吗？他这众所周知的清白无罪者，难道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吗？他在学术上所流的汗水，付出的辛勤劳动，难道就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吗？我的父老啊！这条道路可不是我还乡的道路；不过，如果您或者别人找到一条无损于但丁的名望和荣誉的道路，我会迈着不慢的脚步接受它；因为，如果不走这样的道路进

入佛罗伦萨，我就永远不再进入佛罗伦萨了。为什么这样？难道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见到太阳和星光吗？如果不在佛罗伦萨城和人民面前辱没自己的光荣，甚至使自己名誉扫地，难道我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天空下探求最甜蜜的真理吗？我肯定是不会缺少面包的。”这些话鲜明地表现出诗人的倔强性格和崇高气节。同年九月，佛罗伦萨政府在新的法令中规定，只要肯亲自取保，就可对但丁和其他政治犯把死刑减轻为流放。但丁并未亲自取保。因此，十月十五日，那不勒斯国王驻佛罗伦萨的代表宣布，按照吉伯林分子和叛逆论罪，判处但丁和他的儿子们死刑，自十一月六日起，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侵犯他们的人身和财产而不受惩罚。

我们对亨利七世死后但丁的行踪和生活、行动，所知不详。可以肯定的是，不久他就重新去维洛纳，在堪格兰德·德拉·斯卡拉的宫廷受到优厚的待遇，后来，他把《神曲·天国篇》中的几章献给他，还附上一封拉丁文信，说明《神曲》全书的主题、目的和已经在《筵席》中提到的四种意义。一三一四年，教皇克力门五世死后，但丁写信给意大利的枢机主教们，敦促他们选举意大利人为教皇，把教廷从阿维农迁回罗马，以摆脱法国国王的控制。最后，他大概于一三一八年接受封建主小圭多·达·波伦塔(Guido Novello da Polenta)的邀请，离开维洛纳宫廷，定居于腊万纳。他的儿女都来和他团聚。一三一九到一三二一年间，他曾和在波伦亚讲授古典文学的学者乔万尼·戴尔·维尔吉利奥(Giovanni del Virgilio)用拉丁文牧歌互相赠答。一三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他曾到维洛纳的一个教堂中作学术讲演，论证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水面都不可能高于陆地，后来用拉丁文写成题为《关于水与地的问题》的论文，可见他对于自然科学也很

有兴趣。但他在维洛纳和腊万纳期间，主要是致力于完成《神曲》的创作。《天国篇》刚一脱稿，他就受小圭多·达·波伦塔委托，去威尼斯进行谈判，不幸染上疟疾，回到腊万纳后不久，于一三二一年九月十三到十四日之间的夜里逝世。

《神曲》是但丁的代表作。如前面所述，《新生》末尾表明但丁立志写一部作品，用“人们关于任何一位女性都从未讲过的话”来歌颂贝雅特丽齐。她死后，但丁失去了精神上的向导，一时思想上和道德上迷失了方向，接着又经历了政治上的失败和流亡的艰辛，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觉得自己如同“无帆、无舵手的船在暴风雨中漂流”，同时又看到意大利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黑暗，感到自身是在黑暗中生活的人类的缩影。他计划创作一部作品，把个人的遭遇和祖国以及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把抒写个人迷途知返、悔过自新的过程和给意大利人民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神曲》就是这一计划和以独特的方式歌颂贝雅特丽齐的计划相结合的产物。

《神曲》写作的具体年份难以确定，根据内证和外证，大概开始于一三〇七年前后，《地狱篇》和《炼狱篇》大概在一三一三年前后就写完了，《天国篇》是但丁逝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天国篇》脱稿以前，前两篇已传抄问世。《神曲》原稿已佚，各种抄本文字颇有出入，现在最佳版本是佩特洛齐(G. Petrocchi)的校勘本(意大利但丁学会的国家版《神曲》)。

《神曲》的故事采取了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作品的主人公是但丁自己。诗中叙述他“在人生的中途(即一三〇〇年，诗人三十五岁时)，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他彷徨了一夜后，才走出森林，来到一座曙光笼罩着的小山脚下，刚一开始登山，就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去路。正危

急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贝雅特丽齐嘱托，前来搭救但丁，引导他去游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雅特丽齐又亲自引导他游历天国。游历的过程和见闻构成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三部曲。

和许多中古文学作品一样，《神曲》除了字面的意义外，还有寓言的意义。但丁在给堪格兰德·德拉·斯卡拉的信里说（译文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五章）：“这部作品的意义不是单纯的，无宁说，它有许多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单从字面上来的，第二种意义是从文字所指的事物来的；前一种叫做字面的意义，后一种叫做寓言的，精神哲学的或秘奥的意义……这些神秘的意义虽有不同的名称，可以总称为寓言，因为它们都不同于字面的或历史的意义。”从字面上说，《神曲》的主题是“死后灵魂的状况”，“从寓言来看全诗，主题就是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他还指出，《神曲》是隶属于哲学的，但它所隶属的哲学是“属于道德活动或伦理那个范畴的，因为全诗和其中各部分不是为思辨而设的，而是为可能的行为而设的，如果某些章节的讨论方式是思辨的方式，目的不在思辨，而在实际行动。”这里明确肯定他写《神曲》是为了影响人的实际行动，也就是“为了对邪恶的世界有所裨益”，为了“把生活在现世的人们从悲惨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引导他们达到幸福的境界”。诗中叙述但丁在维吉尔的引导下，看到地狱中罪恶的灵魂所受的惩罚，看到炼狱中因忏悔而已被赦罪的灵魂在升天前所必须经受的磨练，在贝雅特丽齐的引导下，看到各重天上得救的灵魂和圣徒以及天国的庄严景象，最后，在圣伯纳德的指引下，得以凝神观照三位一体的神本身，达到天国之行的终极目的。从寓言来看，这个虚构的神奇的旅行乃灵魂的进修历程。维吉尔象征理性

和哲学，他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象征人凭理性和哲学认识罪恶的后果，从而悔过自新，通过锻炼，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获得现世生活的幸福，贝雅特丽齐象征信仰和神学，她引导但丁游历天国，最后见到上帝，象征人通过信仰的途径和神学的启迪，认识最高真理和至善，获得来世永生的幸福。但丁以个人灵魂的进修历程为范例，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思想行动进行反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密切加以注意，来促使意大利在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希望早日实现。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神曲》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给了中古文化以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现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神曲》是为影响人的实际行动而写作的，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诗人在作品中广泛、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他哀叹“意大利是奴隶”，是“苦难的旅舍”，是“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船”，“不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一个妓院！”“意大利各个城市都充满了暴君”，意大利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城墙、同一城壕的圈子里，人们都自相残杀”，“看一看沿海，再看一看内地，哪有一处享受和平”。他严厉谴责神圣罗马皇帝卢道夫一世和阿尔伯特一世父子只顾在德国扩充势力，不来意大利行使皇帝的权力，“听任帝国的花园（指意大利）荒芜”。诗中还忠实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指出它“在记忆犹新的时间内，曾有多少次改变法律、币制、官职和风俗，更换成员”，“犹如躺在床上不能安息的病人，辗转反侧以减轻自己的痛苦一样”；“暴发户和突然发的横财，在那里滋长了骄傲和放荡无度之风”，在那里“骄傲、忌妒和贪婪是三颗星火，使人心燃烧起来”。诗中对教会的揭露和批判尤其尖锐。诗人愤怒地斥责教皇买卖圣职的罪